

常德城区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历史调查 12 例

陈致远, 柳毅

(湖南文理学院 政史系, 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常德城区 12 名细菌战受害者的 12 个家庭在 60 多年前日军造成的那场悲惨灾难中, 共有 28 位亲人受害, 其中 26 人死亡; 有一家 3 口死去了 2 人, 有一家 5 口死去了 4 人, 还有一家共死去了 6 位亲人。这些家庭几乎家破人亡。

关键词:常德细菌战; 口述历史; 受害调查

中图分类号: K26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6154(2006)02 - 0018 - 05

1941 年 11 月 4 日侵华日军 731 部队对常德实施罪恶的细菌战,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历史档案文献中的记载是有限的, 尤其对常德和平居民的巨大戕害的记载是极为有限的。因此, 进行民间的受害者口述历史调查, 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极其重要的手段和方法; 同时, 60 多年后的今天, 许多受害人已经风烛残年, 加紧进行民间的口述历史调查更是一项抢救历史资料的工作。我们在 2003 年 11 月至 2004 年 1 月这段时间里, 对常德城区 12 名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进行了调查, 请他们讲述其家庭、亲人或本人的受害历史, 获得一定的有价值的口述历史资料。现将这 12 例调查材料按对被调查人的调查时序整理如下。

一 对受害者遗属马培成的调查

时间: 2003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地点: 马培成住址(常德市贺八巷环卫东所职工宿舍 1 单元 302 号)。

调查人: 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马培成: 男, 生于 1955 年 2 月 16 日, 世居常德, 小学文化, 现为常德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临时工。

马培成受害陈述:

我父亲在世时告诉我, 我的祖父和祖母是 1942 年 4 月死于常德鼠疫的。那时候, 我家住在常德城东的“五铺街”, 祖父叫马宝林, 是瓦匠, 那年 53 岁; 祖母叫黄雪梅, 是家庭妇女, 那年 57 岁。当时常德城里发“人瘟”, 死了很多人。4 月初, 我祖母染病, 被政府送入隔离医院, 几天后死亡。隔离医院的病人死后要火化, 祖父不想让祖母火化, 花 4 块银元偷买回尸体, 葬在乡下八斗湾。祖母死后大约一星期, 祖父也染病, 被政府送到广德医院, 入院后很快死亡。当时我父亲只 14 岁, 祖父的尸体他看也没看到, 由医院处理了。

我父亲说, 祖父、祖母死后, 他只身一人成了孤儿, 举

目无亲, 每日以泪洗面。后来为了生活, 就只好去卖鱼, 学做小贩谋生。父亲年岁稍长, 又被“卖壮丁”, 即人家给他一笔钱, 他顶替别人去充当壮丁; 还曾“卖坐牢”, 即人家给他一笔钱, 他顶替别人去坐牢。我父亲真是苦, 吃尽了人间苦难, 而这苦难的根源就是日本 731 部队没有人性的罪恶的细菌战。

调查人按: 马培成的祖父马宝林死于常德鼠疫, 此为历史事实。查阅 1942 年 9 月中国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他 1942 年 5 月至 6 月在常德督导防疫)所写的《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 其中所列《常德鼠疫患者经过情形一览表》, 有受害者“马宝林”的名字及住址和染病、死亡等情况, 现抄录于下:

姓名: 马保林; 年龄: 54; 职业: 工(人); 住址: 五铺街八保; 发病日期: 1942.4.15; 死亡日期: 1942.4.17; 诊断: 腺型(鼠疫)。

二 对受害者遗属刘开国的调查

时间: 2003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地点: 刘开国住址(常德市城东红卫居委会 40 组斗姆阁巷 119 号)。

调查人: 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刘开国: 男, 生于 1927 年农历 10 月 27 日, 现为常德市建设委员会退休干部。

刘开国受害陈述:

1941 年 12 月, 我祖父刘栋成(当年 63 岁), 弟弟成美池(随母姓, 当年 6 岁)死于常德鼠疫。那年我 14 岁, 祖父和弟弟受害死亡时的情况我都曾亲见。那时候, 我家住在鸡鹅巷华严庵 30 号, 全家有 7 口人: 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我和两个弟弟。家境不错, 祖父是德丰祥和德丰南两个酱园老板, 住宅是花三千银元购买的一座很不错的房子。

收稿日期: 2006 - 02 - 25

基金项目: 本文为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立项项目“1941 年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史实与危害考证”(2002 - 8)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致远(1953 -), 男, 湖南常德人, 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授, 研究方向为常德地方历史;

柳毅(1963 -), 男, 湖南常德人, 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抗日战争史。

但1940年前后,日本飞机几乎日日来轰炸常德城,许多市民被炸死,出于安全考虑,祖父让我们全家搬到常德乡下住,只有祖父留在城内带几个店员看守酱园铺。1941年底,祖父在城里染上鼠疫,因为祖父的德丰祥酱园就在城里鼠疫中心地带的鸡鹅巷和关庙街。祖父病得厉害,又不敢入医院,因为怕死在医院后被解剖、火化,便请人抬回乡下(白鹤山周家岗)家中。祖父当时发高烧,脸发红,已不能讲话,只能向我们作手势,三天后死亡,死时口鼻溢出血泡,身上多有紫块,乡下土医生说是“鬼打青”。祖父死后尸体运到德山湘阴会馆坟地(也叫老虎窝)埋葬。

我小弟弟成美池是祖父最疼爱的小孙子,平时和祖父非常亲近。祖父染病回家后,不懂事的弟弟趁家人不备跑到祖父床前亲昵,结果他也染病。祖父刚死被葬,他也发病,其病况也是发烧、气喘,身上发红发紫,与祖父相同,发病两日后即死亡。死后被埋在我家屋后陈小山。

祖父死后,我家在城里的两个酱园铺子垮了,很多账目也因祖父来不及交待而不清楚了,很快我家就破产了,由一般富人家破落得一贫如洗,后来全家生活仅靠父亲在隽新中学教书的薪水勉强维持。日军细菌战是我家这一巨大灾变的祸源。

三 对受害者遗属张礼忠的调查

时间:2003年11月24日上午。

地点:张礼忠住址(常德市武陵区西校场横街25号)。

调查人: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张礼忠:男,生于1932年农历2月5日,小学文化,现为常德工程公司退休职工。

张礼忠受害陈述:

1942年4月,我家死于常德鼠疫的人有3名:我的四弟张国民(当年5岁),我的五弟张国成(当年3岁),我家佣人张国华(女,18岁)。当时我家住在常德城区的常清街,我父亲在常清街经营“张文化刻字店”。记得那年4月份,我家佣人张国华带着我的四弟和五弟到高山街^①一带玩耍,回来后不久即三人都发高烧,颈部起疔,肿痛,口渴,病重时还抽搐。我父亲请郎中(即中医)给他们看病,郎中说怕是染了正在流行的鼠疫,治不了。我父亲很害怕,马上把佣人张国华送回她的乡下老家(苏家渡)。佣人刚送走,两个弟弟在两天内死亡,死后身上发紫发青。我父母亲和家人不敢哭,怕被人知道报告政府要把尸体解剖和火化。次日清早,我父亲趁躲防空警报的机会,用箩筐挑起两个弟弟的尸体,一个箩筐装一个,他们的尸体用衣服遮盖起来,混出城,把两个弟弟的尸体草草埋葬在小西门外乱葬岗。我家佣人送回乡下家中后,也很快就死亡了,佣人的父亲随即找到我家,说是我家害死了他女儿。日本丧尽天良的细菌战真是把我家害苦到了极点!

我的祖父张友元1942年下半年也死于鼠疫。我祖父当时是住在乡下韩公渡龙阁村,他走亲戚到距石公桥、镇德桥

不远的牛牯陂村^②,回来后即患病,高烧、拉肚子、吐血泡,不到三天即死去,死时尸体发黑。日本细菌战夺去了我家无辜的4口人的生命,这笔血债一定要算清!

四 对受害者遗属李明庭的调查

时间:2003年11月24日上午。

地点:李明庭住址(常德市三中北院3栋1单元501室)。

调查人: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李明庭:男,生于1934年农历7月8日,大专文化,现为常德市三中退休教师。

李明庭受害陈述:

1942年4月,我的祖母陈满姑死于常德鼠疫,死时年龄56岁。那时我家住在常德城东的西围墙岩巷子,那年我9岁,记得当地的甲长叫潘茂棋。当时鼠疫已在城内流行,我们家在疫区范围之内,政府挨家挨户给居民注射防疫针。我家6口人,祖母、父亲、母亲、哥哥、我、妹妹。祖母听说要打针,害怕,不愿打,在保长带人到我家打针之前躲起来,结果我们全家只有祖母没打防疫针。4月的一天,我祖母忽然发病,畏寒、高烧、寒战、腋下起疔(淋巴肿大)疼痛,后来身上发现红紫斑块,这都是我亲眼所见。祖母不敢到医院看病,于是请郎中(中医)到家里来看病,但祖母吃药无效,第三天的下午死亡。祖母死后我家不敢声张,怕邻居知道报告政府,要把尸体弄去解剖、火化。当晚悄悄地把祖母尸体运到东门河边斗码头,用小船运往德山平江会馆墓地埋葬(现在的德山永丰村7组)。我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就其泯灭人性的细菌战罪行向中国人民道歉,谢罪,并赔偿损失。

五 对受害者遗属何英珍的调查

时间:2003年11月25日上午。

地点:常德金海宾馆1505房。

调查人: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何英珍:女,生于1934年农历4月26日,高中文化,现为常德市鼎城区血防办退休干部,居鼎城区教师进修学校(丈夫单位)。

何英珍受害陈述:

1941年秋末冬初,我家有6位亲人死于常德鼠疫。当时我家住在常德东门外水巷口(四铺街南面临江一带),住房是面积300平方米左右的木板平房,在临街开一家叫作“保元堂”的中药店,兼营酒类和辣椒,生意不错,家境尚可,全家18口人(伯伯、伯娘、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大姐、二姐、二姐夫、哥哥、嫂子、弟弟、侄儿、两个侄女、两个外甥、我),家庭和睦。

那年大约11月下旬,我嫂子熊喜仔(年29岁)忽然发病,上厕所时倒在地上,扶她起来,发现她发高烧,呼吸困难,不能讲话,颈部淋巴肿大,身上有红紫斑块。我父亲和哥哥前几日入城时在城门口打了防疫针,知道常德正流行瘟疫,

患病后要送隔离医院,死了要解剖、火化,父亲非常着急。果然,第二天吃晚饭时,嫂子死去。嫂子死后我家不敢做声,怕邻居和保长、甲长知道,便在半夜雇小船将尸体运往德山埋葬。过了三天,吃早饭时,我二姐夫也发病了,晒辣椒时倒在地上,症状与嫂子一模一样,次日死亡,我家也是雇小船将尸体运往德山埋葬。天无不透风的墙,邻居知道我家几天内死了两口人,报告甲长、保长。结果政府派来防疫队进行检验,认定是鼠疫,随即用竹夹板将我家围起来隔离,对我家熏烟、打药进行消毒。

我家刚被隔离,我的小弟弟(3岁差一个月)何毛它也患病,两天后死去。再过两天,我侄女(2岁半)何仙桃也患同样的病,两天后死去。父亲把我们小孩和家人赶快送回乡下我外婆家避难,自己在常德死守那点家产。当时正在江西探亲的伯伯和叔叔闻知家庭变故,日夜兼程赶回家来,谁知没几天,他俩也患同样的病相继死亡(伯伯何洪发,时年52岁;叔叔何洪源,时年43岁)。

日本对常德的细菌战使我家受害太深了!我家前后18天,死去6位亲人,我家生意经营也停顿中断,全家生活失去经济来源,二姐被迫改嫁,原来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

六 对受害者遗属蔡正明的调查

时间:2003年11月25日上午。

地点:金海宾馆1505房。

调查人: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蔡正明:男,生于1943年农历2月25日,小学文化,现为个体商业经营者,住在鼎城区武陵镇常沉居委会2组123号。

蔡正明受害陈述:

我的姐姐是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个受害者蔡桃儿^①。我家祖居常德。1941年,我家住在常德城中心地带关庙街。那时我家4口人:父亲蔡德松(48岁)、母亲高金秀(38岁)、姐姐蔡桃儿(12岁)、哥哥蔡正法(8岁)。我当时还未出生。我父亲在关庙街开了一个炭铺,叫“蔡宏盛炭号”。

1941年11月4日,日军飞机在关庙街、鸡鹅巷一带投下许多鼠疫毒物。听我父母亲说,11月4日之后的某天,父亲在下南门码头进炭,我12岁的姐姐打着赤脚去给父亲送饭,结果沾染上了日机撒下的毒。11月11日我姐开始发病,到傍晚已病得很重,高烧,神智不清,遍身发红。我母亲赶快把她背到广德医院住院治疗,但只过了一天,次日早晨就死在医院。我姐死后,医院又不准我家把尸体运回来,而把我姐尸体在东门外驼古堤上火化了。我母亲为此哭得死去活来。很多书上都说,我姐是常德细菌战第一个受害死亡者。我真是非常悲痛愤怒,日本恶魔731部队,为什么要对我姐这样一个12岁的无辜女孩下毒手!

调查人按:1941年11月24日至12月2日,鼠疫专家陈文贵奉命率“湖南常德鼠疫调查队”到达常德进行鼠疫调

查与防治,陈文贵在1941年12月12日写成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中记载了蔡桃儿的患病与死亡情况:“第一例蔡桃儿,病者女性,年11岁,住关庙街蔡鸿胜炭号内。据云,于11月11日发病,于12日晨7时由警局送往常德广德医院诊治。入院时由谭学华医师检视,发现患者神志不清,体温升高至华氏105.7度,右耳有湿疹,淋巴腺未肿大,亦无触痛,肺部听诊有少许水泡音,腹部正常,血液涂片检视,发现形态上类似鼠疫杆菌,遂将患者隔离并与‘色芬里迈’药片治之,至13日晨患者皮肤出现溢血斑点,一般状况更剧,再作血液涂片染色,检视结果同前且更明显,至当日上午8时死亡。”

七 对受害者遗属谢璇的调查

时间:2003年11月25日。

地点:谢璇住址(常德市武陵区湘北一村D区3栋4楼1号)。

调查人: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谢璇:男,生于1928年农历11月23日,初中文化,祖居常德,现为常德市建筑装修公司离休干部。

谢璇受害陈述:

1941年,我家5口人有4口死于常德鼠疫,只剩我1人得以活下来。那时我家住在常德城北的长巷子口上,我父亲在那里开一南货店,店名叫做“兴盛祥南货铺”,旁边是当时较有名的旅店,叫“明月楼旅店”。那年我在城外的清平乡中心小学(现七里桥)读书寄宿,没住在家中;家中4口人,父亲(谢行钧,40岁)在家忙生意,母亲(陈香英,36岁)主持家务,哥哥(谢春初,18岁)协助父亲做生意,妹妹(谢大妹,8岁)随父母在家。

1941年11月4日,日军飞机在常德投下鼠疫。11月中旬,我姨父来学校看我,对我说:“这段时间你不要回家,现在城里发人瘟,要你回家时我再通知你。”两个星期后,我姨父再次来到了学校,要接我回去,他告诉我:“孩子,你爸爸妈妈和哥哥妹妹全部得瘟疫死去了,好在你在外读书,幸得活命。”从姨父转述中我得知:因父亲每日须外出采购货物,日机投毒最多的地方如关庙街、鸡鹅巷、大河街一带是他必经之地,因此染上鼠疫,家里他最先得病,发烧、咳嗽,身上出现红斑,请中医看诊无效,发病三天后死亡。接着我哥哥也发病,很快妹妹也发病,母亲最后也发病,症状与父亲的一样,都是发烧、咳嗽,身上起红斑。哥哥在发病两三天后死去,妹妹和母亲也相继很快死去。姨父说,我家4口人在七天内全部死亡。我家人死后,不敢让别人知道,怕政府对他们解剖、火化,由我姨父请人将尸体在晚上偷运出城,草葬在北门外乱葬岗(今柳堤一带)。我当时13岁,全家人死亡,成为孤儿,心灵受到巨大创伤。尤其此后生活备受艰辛,只能依靠家里原在乡下的7石田产寄居在同房叔叔家里度过凄苦的少年时光。

八 对受害幸存者杨志惠的调查

时间：2003年11月25日。

地点：杨志惠住址(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宿舍)。

调查人：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杨志惠：女，生于1922年农历1月12日，原名杨珍珠，“文革”时更为现名，祖居常德，现为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退休职工。

杨志惠受害陈述：

我和我弟弟在1942年感染了日本飞机在常德投下的鼠疫，但我和弟弟历经劫难活了过来。当时我家住在教会医院广德医院的对面，是一间没有地板的木板平房。家里3口人：母亲、我和弟弟。父亲在前两年被日机轰炸常德时炸死。我家临街，靠母亲在家门口卖些香烟等杂货小生意维持一家生活。我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因此给我取名杨珍珠，弟弟取名杨彼得。当时教会办了一所教会学校(懿德中学)，教徒子女可以免费入学，所以我和弟弟都在那里上学。

1942年4月的一天，我和弟弟放学回来，忽然同时发病，两人的症状一样，高烧、抽搐、淋巴起疔，病势急重。当时常德流行瘟疫，急重病人都送入隔离医院。我家左边隔壁一崔姓邻居(开棕索棚子铺)和右边隔壁一罗姓邻居(开香肠店铺)，见我母亲无能为力，就把我和弟弟抬到隔离医院去治疗。我母亲知道瘟疫死人很多，入了隔离医院很难活着回来。于是去找同是教会教徒的教友广德医院谭学华院长，谭院长可怜我家，将我和弟弟转到了广德医院来治疗。结果我和弟弟都被治愈，我腿肚子处至今还有给我淋巴开刀放脓的伤痕。我弟弟现在在贵州。

日本鬼子把我家害苦了。我现在83岁了，一身疾病，(哭)我也成了一废人了，活不了几天了。日本的“官司”为什么还不打完，我也看不到那一天了！(哭)我父亲也是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的……(哭)

调查人按：杨志惠老人身体十分虚弱，眼也看不清东西，要求调查时间不要太长。她情绪很激动，说到伤心处便不时哭泣。杨志惠和她弟弟患鼠疫的事实当时的防疫档案中有记载，1942年10月防疫部门写成的《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中的“常德鼠疫患者情形表”记录：

杨珍珠，20岁，女，学生，住五铺街90号，1942年4月14日发病，治愈，腺鼠疫；杨彼得，13岁，男，学生，住五铺街90号，1942年4月13日发病，治愈，腺鼠疫^①。

九 对受害者遗属方运胜的调查

时间：2003年11月26日。

地点：方运胜住址(常德市武陵区城北柏子园居委会3组)。

调查人：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方运胜：1945年生，世居常德城，高中肄业文化，现

为个体商业经营者。

方运胜受害陈述：

我的哥哥方运登1941年死于常德鼠疫。我哥哥受害情况是我父亲、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因我当时还未出生。1941年我家住在常德城北的灵官庙街，全家6口人：父亲、母亲、奶奶、姑姑、姐姐、哥哥。当时哥哥只有8岁，还是个孩子。那年深秋，大约是11月下旬。因我家开米粉店，大家都很忙，没人照看我哥哥，以致我哥哥误吃了老鼠爬过的冷饭。不久我哥哥发病，症状是发高烧、呼吸困难、脸上发黑，发病一天就死去了。死后埋在城外赵家山(今气象局旁)。我哥哥当时是独儿，暴死之后，我奶奶非常悲痛，因此而精神失常，常常一人在街上穿行，呼唤着我哥哥的名字。记得我做孩子的时候，奶奶还时常牵着我的手在街上呼唤着我哥哥的名字……

十 对受害者遗属高绪官的调查

时间：2003年11月26日上午。

地点：常德金海大酒店1505房间。

调查人：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高绪官：男，生于1944年农历10月5日，中专文化，现为津江市三洲驿街道办事处干部，居津江市澧津路72号。

高绪官受害陈述：

我的两个哥哥1941年死于常德鸡鹅巷鼠疫。我家祖籍原在汉寿县新兴嘴。1941年投靠亲戚迁居到常德城的鸡鹅巷，在那里搭一个窝棚为家。那时我家5口人：父亲、母亲、大姐、大哥、二哥。当时生活十分艰难，靠父亲挑河水卖，兼做小水果生意养家糊口。有时母亲还带姐姐、哥哥外出讨饭。那年11月份的时候，我的两个哥哥忽然病倒、发高烧，大哥病情厉害些，口里还吐白沫，神智不清，有时还抽搐，母亲急得哭。父亲连夜租小船将两个哥哥运回老家汉寿新兴嘴八角村。次日上午，大哥高绪武(当时13岁)死亡；下午两点多钟，二哥高绪文(当时11岁)也死亡。两人尸体都呈青乌色。我父亲用木板钉两副匣子，将他们葬在老家附近老林山。两个哥哥死后，父母亲悲痛万分，尤其母亲，一度精神失常两月，眼睛也几乎哭瞎。事后，父母不敢再住在常德，带着姐姐迁到汉寿荒无人烟的围堤湖，在那里开荒地过日子。

十一 对受害者遗属柯高茂的调查

时间：2004年1月6日上午。

地点：柯高茂住址(常德市自来水公司职工宿舍6栋2单元1号)。

调查人：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柯高茂：男，生于1925年农历12月24日，祖籍湖北洪安，1934年随养父(亲叔叔)迁居常德，高中肄业文化，现为常德市港航监督处退休职工。

柯高茂受害陈述：

大约1941年11月中下旬,我的养父柯先福(时年56岁)死于鼠疫。当时我家住在常德城的关庙街刘义茂线铺斜对面,木板房,地面铺木地板,我家在那里开五金铺。家里7口人:养父、养母、姐姐、我、3个弟弟。当时我16岁,在乡下隽新中学读书,家里人则住在乡下芦狄山(那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常德,住在城里不安全),只有我的养父一人住在城里照着五金铺。那年11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回城里看望养父,同时准备向他要点零花钱回学校用。养父见到我说:“你回来干什么?前些时候,日本飞机在我们这里投了毒物,政府把我家对面的胡家巷都封锁了,你住一晚,明天赶快回学校去。”我在次日清早五六点钟离家回学校了。但过了六七天,我弟弟到我学校告诉我:父亲死了,你赶快回去!

回去后知道,我养父在我上星期看望他后,不久就发病,高烧,颈部起疔,肿痛,病急而重。家里人便把他抬回乡下芦狄山,一两天后死去。我看到养父的尸体,脖子肿得很大,身上皮肤红一块、紫一块。我是长子,我和家人披麻带孝,将养父运到德山湖北会馆墓地埋葬。

养父死后,我家的五金铺也就倒闭了,全家经济生活的来源没有了,我家此后的状况真是苦不堪言。我不能继续升学,几个弟弟和姐姐都各奔东西,一个家就这样被日本鬼子毁了。

十二 对受害者遗属黄炳辉的调查

时间:2004年1月7日上午。

地点:常德细菌战受害接待处。

调查人: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黄炳辉:男,生于1945年农历3月6日,祖居常德,大专文化,现为常德市武陵区检察院离岗干部,居常德市图书馆职工宿舍。

黄炳辉受害陈述:

1942年的三四月份,我的两个哥哥黄奕秋(4岁多)、黄元武(2岁多)死于常德鼠疫。1938年前,我家住在常德城中心地带的小梳子巷,家有200多平方米木制结构私房两栋,

我父亲在那里开茶楼,家境殷实。但1938年12月,日本飞机轰炸常德,我家房子被日机投下的燃烧弹击中烧毁。我家从此一贫如洗,成为难民,只好逃到常德东门外的寺庙“红庙”中寄居,靠父亲给人帮工维持生计(我父亲能双手打算盘,在店铺给人帮工)。寄居红庙时,我家5口人:父亲黄金海、母亲李爱清、姐姐黄泳桃、大哥黄奕秋、二哥黄元武。1942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当时我家住的红庙就在流行鼠疫死人不少的五铺街附近,一天,我大哥黄奕秋和二哥黄元武忽然发病,畏寒、高烧,人像“打摆子”似的,呕吐,脖子很快肿大,话也讲不出来。父母亲非常恐惧,怕是染上了五铺街流行的“人瘟”(那时不知是鼠疫,老百姓叫“人瘟”),不敢去看病,也没钱去看病,又怕别人知道,听说政府要把得“人瘟”死的人解剖、火化。很快,两个哥哥在三天内相继死亡,死时身上皮肤发乌。我两个舅舅李仲诚和李元冬来我家帮忙钉两个木匣子把他俩埋在红庙附近的土岗上。这些事今天我的小姨76岁的李芳清(我母亲的妹妹)还能述说。

我家1938年由于日机轰炸,从小康殷富人家破败到难民的地步,1942年我的两个年幼的哥哥又被日本飞机投下的鼠疫害死,日本的侵略使我家破人亡。两个哥哥死后,我母亲每日以泪洗面,精神恍惚,1945年生下我后悲伤之情才有所好转。记得1960年元宵节时,父亲忽然对我说:“今天是你二哥元武的生日,元武生于元宵节,所以取名叫元武,元武要不死,今年应该是22岁了,唉……”可见我两个哥哥的死给我父亲心灵的创伤,多少年后还未抚平。

注释:

- ①据历史防疫档案记载,1942年4月是常德鼠疫流行高峰期,高山街一带是疫区。
- ②据历史防疫档案记载,1942年下半年石公桥、镇德桥一带正流行鼠疫。
- ③许多历史档案都记录了蔡桃儿是常德第一个鼠疫牺牲者,并被解剖。
- ④参见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湖南省档案馆馆藏,74-3-6。

(责任编辑:许小主)